

§ 历史学研究 §

## 一个三角洲城镇的上游区域： 16—19世纪西江流域的九江移民<sup>①</sup>

麦哲维 (Steven B. Miles)<sup>1</sup>, 邹薇译<sup>2</sup>

(1.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历史系, 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 63130-4899;

2.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本文将珠江三角洲九江集镇置于中国南部西江及其支流的城镇系统中, 关注 16 至 19 世纪沿西江流域上游活动的官员、科举考生、商人和定居者, 探索其作为一个移民社区的历史。西江水系的地理因素形塑了九江移民的迁移轨迹。与此同时, 移民不仅同九江的各个家族为了发展社会经济而采取的策略有关, 也同明清政府控制西南边疆的政策有关, 在一个由经济纽带和个人关系网联系起来的统一区域的历史构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关键词:** 集镇; 移民; 区域; 明朝; 清朝; 西江; 珠江三角洲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0766 (2014) 01-0025-11

九江是一个位于珠江三角洲南海县的集镇。1883 年的九江地方志讲述了一个奇特的故事, 是关于两个当地男子沿西江流域上游以相反方向前行而相遇的故事。其中一位男子是姓岑的鱼贩, 他从广西返家途中偶遇岑时发。岑时发是 1723 年的举人, 既是鱼贩在九江的同乡亦是同宗。鱼贩询问时发欲往何处。时发“冠服徐行”, 回答正欲去江边乘船。鱼贩见一艘船正在等候时发, 船头插帜竖牌, 上书“泗城府城隍”。鱼贩方欲转诘其故, 岑时发和那条船便已消失。在岑姓鱼贩回到九江的家后, 他得知岑时发已经死了, 就死在他们相遇的那天。<sup>②</sup>

这则鬼故事揭示了沿河流迁移的文化。岑时发沿西江向上游行进, 西江则是从广西流入珠江三角洲。他的冠服表明他在朝为官, 抑或是祖先的画像。无独有偶, 彼时, 远在广西西部的泗城府老土司家族也姓岑, 而泗城府新近才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sup>③</sup>岑姓在九江也是一个大姓, 但是大多数九江的谱系源自一个共同的传说: 宋朝时岑姓从中原经广东北部迁徙而来。九江岑氏不会因声称与西南边陲的前土司家族是同宗而获得威望。<sup>④</sup>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岑姓鱼贩在下游的平凡之旅。尽管在故事中没有被加以强调, 尽管一个九江听众听起来或许习以为常, 但是它暗示了分布广泛的维系着九江经济利益。在他们相向而行的旅程中, 岑姓和其他九江人将上下游地区联系起来。

**作者简介:** 麦哲维 (1964—), 男,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邹薇 (1981—), 女, 四川成都人,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sup>①</sup> 英文原文发表在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中国历史学前沿》), 2013 年第 2 期。

<sup>②</sup> 《九江儒林乡志》卷十四, 1883 年, 第 6b-7a 页。

<sup>③</sup> 同广西当地很多土司一样, 泗城的岑氏家族声称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中原的汉人, 曾经参与了狄青 (1008—1061 年) 平侬智高之乱的战役 (1025—1055 年)。《泗城岑氏家谱序》卷八, 《西林岑氏族谱》, 1888 年, 第 3b-4a 页。关于侬智高, 参见 James Anderson, *The Rebel Den of Nung Tri Cao: Loyalty and Identity along the Sino-Vietnamese Frontier*,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7。泗城于雍正五年 (1727 年) 由土司制变为流官制 (改土归流)。《清史稿》,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年, 第 14297 页。

<sup>④</sup> 光绪《南海氏族》卷二《主簿司》, 第 5b 页。《南海九江乡志》卷二, 1657 年, 第 5b 页。关于珠江三角洲各谱系后裔的主张, 参见 David Faure, “The Lineage as a Cultural Invention: The Cas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Morden China*, Vol. 15, No. 1 (1989), pp. 8-14.

西江流经广阔而繁荣的珠江三角洲地带,九江正好位于西江河畔,具有向上游地区输送移民的丰厚条件。17世纪时这个集镇拥有高度商业化的经济,这得益于丝绸生产、西江鱼苗(尚未长大的刚孵化的小鱼)销售和广西大米的进口。<sup>①</sup>肇庆下游的羚羊峡将九江和余下的三角洲地区同西江上游分开。越过羚羊峡,西江的水系及其支流还流经广东西部的肇庆府和罗定州以及邻省广西超过4/5的土地(位于湘江流域的桂林府部分地区和广西东南南流江入海口附近的地区除外),还有越南北部的部分地区。<sup>②</sup>

在早期的研究中,相对于更为国际化的广州我曾强调九江的狭隘性和封闭性,强调19世纪九江精英为维持小镇繁荣和他们在小镇的地位所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sup>③</sup>在这里,我通过将九江置于更大的西江流域来强调九江及其附属村庄的不同特性,作为一个移民社区,其成员的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了三角洲地区,远及西江上游及其支流地区。尽管缺乏可用的数据,传记作品和其他史料表明,短期或者长期的迁移构成了相当数量的九江男性居民的重要人生体验。如同现代一些移民地区将中国移民送至海外一样,很多九江家庭将男性移民作为提高其社会经济地位的策略之一。<sup>④</sup>同样,九江是16至19世纪珠江三角洲地区诸多向西江流域上游输送移民的城镇和乡村的代表。因此,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背后是一个更大的、在1570至1900年间沿西江流域扩散的广东移民轨迹。此外,对九江的研究展示了近代早期江河流域的诸多集镇是如何通过移民这种方式联系在一起的。

19世纪晚期之前九江移民的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河流运输线路。离开九江的人通常直奔广东西部和广西在西江及其支流沿岸的县城和集镇,甚至去更上游的地方。换言之,由于低成本和水上交通降低的“路程阻力”,西江流域以及将它同其他水系分开的群山形成了一个连贯的区域来引导迁移。<sup>⑤</sup>相应的,人的流动性——人口在上游与下游的运动——也形塑了这片区域。移民不仅同九江各个家族为了发展社会经济而采取的策略有关,也同明清政府控制西南边疆的政策有关,在一个由经济纽带和个人关系网联系起来的统一区域的历史构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sup>⑥</sup>

本文追寻16至19世纪从九江迁往上游目的地的人,他们大多为男性。通过这种流动性,他们将本土集镇同上游绵延数百英里的河港连成一条链。探寻他们的动向不是为了展现一大堆行政或经济中心的等级结构,而是为了展示连接三角洲城镇的河港网,它如同大都会般运作,其上游口岸的规模不一,包括集镇、县以及州府所在地各类。<sup>⑦</sup>因此,我的研究可以证实陈春声和罗伯特·马克斯所描绘的景象,他们遵循罗一星提出的树枝状模式,认为在西江流域,上游的“外围”地区在经济上从属

① 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页; David Faure, *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07 - 214; Robert B. Marks, *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91.

② 西江流域还包括贵州南部和云南东部,本文对此不作探讨。宾长初《广西近代圩镇的综合考察》,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页;刘文俊《农业与广西近代圩镇》,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第107页。

③ Steven B. Miles, *The Sea of Learning: 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Guangzhou*,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4 - 45, 239 - 243.

④ Chen Yong, "The Internal Origins of Chinese Emigration to California Reconsidered,"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 28, No. 4 (1997), pp. 522, 546; Adam McKeown, *Chinese Migrant Networks and Cultural Change: Peru, Chicago, Hawaii, 1900 - 193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 66; Michael Szonyi, "Mothers, Sons and Lovers: Fidelity and Frugality in the Overseas Chinese Divided Family before 1949,"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Vol. 1, No. 1 (2005), p. 60; Philip A.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8, p. 15.

⑤ G. William Skinner, "Mobility Strateg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Regional Systems Analysis," in Carol A. Smith, ed., *Regional Analysis*, Vol. I, *Economic System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p. 328;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212, 216, 282; 李挺《交通与广西近代圩镇研究》,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第342 - 344页; James C.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45.

⑥ Marks, *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p. 14. 虽然强调自然地理的制约,但施坚雅在一些地方也指出移民在区域一体化中的作用。Skinner, "Mobility Strateg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 360.

⑦ 施坚雅所描述的经济中心地区的等级结构在宾长初的著作中有所体现,后者认为基本圩镇和中心市镇是连接农村和城市的桥梁。宾长初《广西近代圩镇的综合考察》,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第59 - 60、79页。

于下游的各个中心。<sup>①</sup> 本文从九江透视这一系统, 追踪其成员如何利用上游的资源与机遇, 并且在上游定居。随着这些移民的流动, 我考察了将九江人引入上游地区的三种活动, 即做官任职、赶考和经商, 然后关注声称来自九江、定居在上游的那些人的迁移传说。无论是官员、考生还是商人, 每种移民模式都遵循着由家族策略和国家政策形成的、各自的逻辑, 但是他们的活动范围在地理上都集中于西江及其支流流经的地区。<sup>②</sup>

## 官 员

在岑时发的故事中, 一个土生土长的九江人死后被派往广西泗城府, 这可能对九江的读者有所影响, 因为上游还保存有当官的传统。<sup>③</sup> 当然作为一种移民形式, 参与地方管理的官员在调动时很少有选择目的地。虽然如此, 当帝国政府遵循一种将广东人分配到广西的选派模式, 这些官方的任命会将九江的精英派遣到新近同九江经济息息相关的上游地区。虽然在 18 世纪很少有九江人被派往广西, 但是九江地方志中有大量明代在广西任职者的传记。例如, 除了 1 人在桂林藩国任职外, 明代 44 个在科举考试中的最高头衔为举人的九江人中, 有 12 人有在广西任职的经历。<sup>④</sup>

关于九江两个联姻家族朱氏和曾氏家族成员任职的记载, 说明在这个城镇集体的记忆中赴广西任职是很普遍的。1531 年, 朱文锦 (约 1478—1531 年) 在担任过训导和桂林府其他两个县的署知县之后, 死于桂林府义宁县署知县任内。<sup>⑤</sup> 朱文锦的女儿曾陪他赴任, 其父死后她扶棺南下回到九江。此后她将嫁给曾氏家族的后代曾应珪 (1543 年举人)。<sup>⑥</sup> 九江的传记作家称赞曾应珪孝顺, 他用在九江当教席的收入来赡养他的父亲, 其父是一名退休的官员, 名叫曾俊 (1507 年举人)。<sup>⑦</sup> 与此同时, 传记作者强调其父作为一个官员非常正直。曾俊在嘉靖年间早期被任命为广西北部融县的知县。“邑之牛税入千缗, 前令多干没, 公悉登于籍, ……至今融人思之。”<sup>⑧</sup> 曾俊的一个弟弟叫曾储 (1516 年举人), 1533 至 1534 年间由湖广某州知州改任南宁下游的横州知州。<sup>⑨</sup> 曾储的孙女嫁进了朱家; 她丈夫的侄儿朱光祖 (1612 年举人) 也曾在广西当官。<sup>⑩</sup> 朱光祖曾任融县知县, 九江的传记作家们敏锐地注意到这是曾俊在一个世纪前曾担任过的官职。<sup>⑪</sup>

另一个九江的曾氏, 曾陈诗 (约 1575 年生) 在 1642 年被任命为南宁沿左江上游的新宁知州。曾家院子中的两块大石提醒着曾陈诗的子嗣关于他曾在新的任职的事迹。围绕着石头的传说是这样的, 作为一个官员他非常清廉, 因此当他从新宁卸任回九江时行李是空的, “舟轻恐不能渡海, 取二巨石镇舟”。归家后他“令子孙世守之”, 作为其美德的象征。<sup>⑫</sup>

① 陈春声 《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 18 世纪广东米价分析》, 第 39 页; Marks, *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pp. 190–192, 264.

② S. M. Haslam, *The Riverscape and the Riv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7, 53–54.

③ 在关于唐宋时期城隍崇拜形成的研究中, 结合其来源, 大卫·强生指出主要有三种类型的城隍爷。其中两类让我们想到了关于岑时发的传说: 有些城隍爷是之前备受爱戴的官员, 另一些则是开拓移民区域并成为地方性的铁腕人物。David Johnson, “The City-God Cult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5, No. 2 (1985), p. 424.

④ 《南海九江乡志》卷三, 第 4b–13b 页。明代九江本地人到广西任职的显著例子, 包括一名 1457 年的进士, 他担任的职务有按察僉事和提督学政; 他的儿子是 1497 年的岁贡生, 被任命为北流县县学训导; 还有一名 1522 年的举人任全州知州; 一名 1534 年的举人授南直隶某县知县改宣化知县 (亦是南宁府治所在); 一名 1600 年的举人曾担任永宁知州。《南海九江乡志》卷三, 第 1a、6b、7a、11a、14b 页 《关树德堂家谱》卷二十, 1897 年, 第 16b–17a 页。

⑤ 《南海九江朱氏家谱》, 1869 年, 卷六, 第 4a、48a 页; 卷十一, 第 9b–10a 页。

⑥ 《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卷十一, 第 105a–b 页。

⑦ 《九江儒林乡志》卷十二, 第 9a 页。

⑧ 郭裴 《粤大记》,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第 605 页。

⑨ 《横州志》卷九, 1746 年, 第 20a 页。《南海九江乡志》卷三, 第 6b 页; 卷四, 第 3b–4a 页。

⑩ 《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卷四, 第 35b–36a 页 《南海九江乡志》卷五, 第 17b 页。

⑪ 《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卷六, 第 51b 页; 卷十一, 第 48a–b 页。《南海九江乡志》卷四, 第 19a–b 页。在 1800 年的广西地方志中, 朱光祖列在万历年间 (1573–1620 年)。《广西通志》卷三十二, 1800 年, 第 24b 页。

⑫ 《南海九江乡志》卷三, 第 13b 页; 卷四, 第 23–24b 页。《新宁州志》, 1878 年,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5 年重印, 第 262 页 《九江儒林乡志》卷二十一, 第 10a–b 页。

1657年至1883年九江地方志中此类事件的读者,以及更多的听闻关于亲戚和邻居故事的九江居民都清楚一点,在广西任职是共同的经历。传说主要是为了突出九江人的廉正,但同时也凸显出了即将在上游获得的利益,包括贸易以及开采自然资源。对这样的听众来说,将岑时发指派为泗城的城隍爷而非其他流域的类似的官员是有道理的。从九江的角度来看,有九江本土子孙任职的众多广西衙门都位于商业中心,它们都是西江流域水道沿线可识别的特殊的停靠港。

### 考 生

一些九江人在广西当官,他们的职位至少能使他们有机会在科举考试过程中帮助他们老家的同胞。以融县知县朱光祖为例,他亦担任过1630年广西乡试同考官。<sup>①</sup>之前,九江人陈良珍(1549年举人)是1567年广西乡试的同考官。<sup>②</sup>另一位九江人关沛(1579年举人)是1591年广西的同考官,次年被任命为梧州府容县知县。<sup>③</sup>

负责管理低级别科举考试的官员包括广西提督学政和诸多府学教授及县学教谕、训导等。关骥(1604年进士)于1622年被任命为广西副使和提督学政。<sup>④</sup>一则明朝晚期的石碑传记强调在他任职期间,因广东和广西毗邻,很多关骥的同乡(乡人士)移居广西;尽管是同乡,关骥仍坚定地将这些人清理出册。那些在1624年和1627年通过广西乡试的试子都是关骥所承认的才子。<sup>⑤</sup>一些被关骥驱逐的考生移民可能包括从九江来的同乡,这可以从明朝至少有两位九江人通过广西梧州府下不同的县中举的事实得到验证:吴学规,1576年中举,容县户口;黄茂先,1642年中举,来自邻近的岑溪县。事实上,黄茂先榜姓“李”,这意味着某种程度上是违反国家政策的。<sup>⑥</sup>正如赞扬像曾俊和曾陈诗这样正直的官员使人在无意间注意到上游地区的利益,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描写关骥拒绝照顾在广西参加科举考试的广东人,表明移民考生如果没有遇到一丝不苟的考官还是有机可乘的。

尽管将一个人的户籍从三角洲的县镇改到上游县镇需要付出时间和金钱,从16世纪开始大批的九江人和其他广东人迁移到上游地区,这成为他们通过科举考试的一条捷径。以九江朱氏家族的一个支系为例。朱诰和朱谟兄弟都是通过泮水(现为罗定)县学成为生员。泮水在广东西部西江以南,靠近广西边境。朱谟17岁时(约1532年)成为廪生,1541年成为贡生。<sup>⑦</sup>16世纪70年代,明朝政府对一批未登记的人口进行了一次军事行动,这些人在明代文献中被称为罗旁山区的“瑶”,罗旁山从泮水北部一直延伸到西江。当战事在1577年初结束时,明朝试图在该地区实施更有力的行政控制,并鼓励汉族移民开垦土地。他们在罗旁地区外新建了两个县,包括广西边境上的西宁县(现为郁南县)。<sup>⑧</sup>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支朱氏家族中一共有14个人凭借西宁户籍考取了功名。尽管少数几人成为贡生,他们中大多数人,包括朱谟的一个孙子,只取得了生员的地位。<sup>⑨</sup>这些移民学生中某个

① 《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卷六,第51b页 《南海九江乡志》卷四,第19a页。

② 《南海九江乡志》卷三,第7b-8a页。

③ 关沛因丁忧未赴容县上任。《关树德堂家谱》卷六,1897年,第14a页;卷二十,第12b页 《南海九江乡志》卷三,第9b页;卷四,第11a页。

④ 《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966年,第10a页 《南海九江乡志》卷三,第2b-3a页。

⑤ 鉴于墓志铭的作者是土生土长的博罗县人,该地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东部边缘,我更倾向于更为宽泛地用“乡人士”来指称我们所说的“广东人”,而不是九江镇当地人。《九江儒林乡志》卷七,第21a-24a页。

⑥ 《梧州府志》卷十三,1631年,第12b页 《广西通志》卷七十二,1800年,第20a页 《南海九江乡志》卷三,第9b、14a页 《九江儒林乡志》卷十,第25b页。

⑦ 《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卷六,第63a页;卷十一,第15b页。他还有个表亲朱学章,同为泮水县学庠生。《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卷四,第5b-7a页;卷六,第63b页。

⑧ 关于明代广西附近瑶和其他族群的分类,参见Leo K. Shin,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State: Ethnicity and Expansion on the Ming Borderlan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40-157; Steven B. Miles, “Imperial Discourse, Regional Elite, and Local Landscape on the South China Frontier,”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Vol. 12, No. 2 (2008), pp. 99-136.

⑨ 这些西宁生员包括朱渲和朱润兄弟(1602年岁贡);后者后来编纂了西宁第一部地方志,于1592年出版。他们的两位侄子通过新西宁县县学也取得了生员的地位。《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卷六,第63b-67a页。

人的墓志铭作者解释说, 在平定罗旁的瑶民后, 官员“征我广南海人士为庠序光”。<sup>①</sup> 据现有证据, 这些暂居的学生没有在上游的西宁永久定居, 但是他们的一些远房亲戚则定居在那里。<sup>②</sup>

九江的家族利用国家努力开拓西南边陲为己谋私的模式一直持续到清朝初年。西宁在清初仍旧是移民的目的地, 一个姓曾的九江人即以西宁户籍在 1717 年中举。<sup>③</sup> 在更上游的地方, 1732 年冯秉纲以太平府学生身份中广西举人, 太平府位于新宁州沿左江的上游地区。<sup>④</sup>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一个不太成功的例子, 陈奋, 九江人, 在三角洲城镇受教于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师。1720 年前后, 陈奋在广西西北高地的西林县定居, 此地于岑时发魂魄的目的地泗城府的正西方。几年后, 陈奋在县试中名列首位成了西林的一个生员。这使得他可以参加 1726 年广西丙午秋闱, 他的答卷被该专业领域的副考官们传阅, 但是陈奋没有进入前 50 名通过当年的考试。他没有灰心丧气, 反而在 1727 年和 1728 年的岁科两试中都名列第一。可是, 根据他的九江传记作家记载, 陈奋“遂以名噪遭忌”, 结果在 1729 年的乡试中“不得进场”。1731 年, 陈奋迁回原籍南海, 于是得以进入当地的学校。<sup>⑤</sup>

清王朝统治的后半段, 那些为科举而在西江流域地区登记的九江人往往不在新开发的边疆地区登记入籍, 而是在与三角洲城镇有大量商业联系的广西东部地区。例如在 1839 年, 两名九江人明之纲和朱文彬以苍梧县户籍中举。明之纲之子明缵道在 1861 年以苍梧县居民的身份重复了这一壮举。<sup>⑥</sup> 如同西宁的朱氏和西林的陈奋, 这些 19 世纪的旅居者金榜题名后倾向于将重心转移回九江。<sup>⑦</sup> 其他通过广西户籍考取功名的九江人中包括一名 1861 年的藤县举人, 一名 1862 年的马平县 (柳州府治所在) 举人, 一名 1864 年的桂平 (浔州府治所在) 举人和一名 1867 年的梧州举人。<sup>⑧</sup> 一个不太著名的例子出现在九江六个关氏家族之一的家谱中。该家族的第二十一代子孙在 19 世纪很活跃。这一代中有个人叫关萃奇, 家谱表明他是苍梧县学的学生。同时家谱列表显示他的祖父葬在广西。<sup>⑨</sup> 关棫宗 (1859—1904 年) 是商人之子, 也是另一支九江关氏的一员, 于 1896 年通过浔州府武宣县官学成为生员。<sup>⑩</sup>

这些九江人同许多广东人一样追求的是功名, 这一过程产生了大量的流动人口。被嫁接上了科举考试体系的行政等级制度, 形塑了与科举相关的移民模式, 但并不能保证总是按照国家行政官员的意志运行。<sup>⑪</sup> 来自九江的旅居考生并没有沿着行政等级中的发展路径一路向上, 从州县到府再到省, 而是选择横向移动, 找寻系统中的薄弱环节, 那里不如南海和其他珠江三角洲集镇的竞争激烈, 因此移民能够更容易地考取功名。由于明代官员的任命方式, 九江移民选择入籍并参加考试的上游诸州县的分布, 就与九江经济利益所在的上游区域发生了重叠。然而, 踌躇满志的九江考生在挑选目的地时是有回旋余地的, 这比起国家任命官员的选择空间要大得多。这种选择受限于行政等级制度, 同时也受

① 《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卷八, 第 85b 页。其余在西宁获得功名的九江人包括三位岁贡: 关要 (1608 或 1609 年)、岑翔凤 (1624 或 1625 年) 和黄国英 (1634 或 1637 年)。西宁 (前者) 和九江 (后者) 地方志中对日期的记载不完全一致。《南海九江乡志》卷三, 第 16a-b 页。《西宁县志》卷九, 1830 年, 第 3b-4a 页。

② 例子参见《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卷六, 第 65a 页。《南海九江乡志》卷二, 第 12b 页。《九江儒林乡志》卷十三, 第 16a-b 页; 卷十七, 第 2a-b 页。

③ 《西宁县志》卷九, 第 6a 页。

④ 《九江儒林乡志》卷十, 第 39b-40a 页。

⑤ 西林在 1718 年编纂地方志时还没有县学。同年, 西林的第一位生员被分配到上面的府学, 那时还是思恩府。《九江儒林乡志》卷十四, 第 10a 页。《西林县志》, 前言。

⑥ 《苍梧县志》卷四, 1874 年, 第 35a、38a 页。

⑦ 明之纲和朱文彬葬于九江。《九江儒林乡志》卷六, 第 26b、27b 页。

⑧ 藤县志载 1861 年藤县举人李锡爵是一位顺德县人, 顺德在九江下游。《九江儒林乡志》卷十, 第 55b-57b 页。《柳州县志》卷七, 1932 年, 第 23 页。《藤县志》, 1908 年,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68 年, 第 487 页。《桂平县志》卷四十二, 1920 年, 第 10b 页。《同治六年举行丁卯科广西乡试题名录》, 第 2b 页。

⑨ 《关树德堂家谱》卷九, 第 92a 页; 卷十一, 第 37a; 卷十四, 第 6a 页。

⑩ (南海九江关氏《世系录》, 1934 年手抄本, 第 74-79 页。

⑪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168-169; 王日根、张学立《清代科场冒籍与土客冲突》,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1 期; 岸本美绪《冒捐冒考诉讼与清代地方社会》, 邱澎生、陈熙远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第 145-173 页。

限于交通和商业网络。九江文人寄希望于利用上游较少的科举竞争而走上由九江商人开拓的水上之路。通常情况下,如上文关棫宗的例子,九江文人在上游区域亲戚经商之处落户。如同下文所述的商人和永久定居者的迁移一样,九江考生的流动将不同区域横向联系在一起,这些区域都是以九江为中心的的网络的外围各点,在国家行政体系中是有等级划分的。

## 商人

梧州是西江贸易的重要转口港,1631年其地方志中描绘了来自南海和其他珠江三角洲城镇的商人,他们控制了梧州的盐和木材贸易。<sup>①</sup>该地方志第一稿的作者是陈熙韶,同九江有一定的关系。陈熙韶是广州城西某村人氏;他于1619年或1620年被任命为梧州府同知之后编纂了该地方志草稿。其弟陈熙昌(1616年进士)娶了朱氏家族一位重要成员的女儿,落户九江。熙韶和熙昌的表妹嫁入九江,她的丈夫曾氏是融县知县曾俊和义宁县署知县朱文锦的曾孙。<sup>②</sup>

比起其他在明代晚期被任命到广西的官员,陈熙昌肯定对梧州的九江商人要熟悉得多。自16世纪以来,来自九江和三角洲其他地方的商人不断在西江上游地区规划其经济利益。他们控制了上游贸易市场广东海盐和制成品的销售,以及下游地区广西大米、木材、矿产、花生、桐油和药材的销售。<sup>③</sup>九江经济的繁荣正如其他三角洲城镇一样,取决于其商人在西江及其支流上下游的流动。这一点体现在九江和上游港口地方志的描述中。例如,一则关于从西江进入九江内陆各条水道的记载,描绘了众多商船在年末返回九江时在航道中拥挤的场景。<sup>④</sup>九江模范妇女的传记中记载了一位死在广西的商人的妻子,这位寡妇的公公在广西经商时被土匪袭击,该女子悉心照料公公直至其康复。<sup>⑤</sup>19世纪一个九江商人的传记记载,在澳门贩卖丝绸以及在九江开店之前,他是在梧州找到工作并起步的;他从梧州寄钱回九江以赡养老母。<sup>⑥</sup>在龙州有很多活跃的九江商人,此地处于广西西南部中越边境附近,因此19世纪末时人们在城外专门为九江人修建了一座慈善性的墓地。<sup>⑦</sup>

使九江在珠江三角洲城镇中显得独一无二的是其在鱼类养殖方面的垄断地位。早在1657年,地方志编纂者声称九江农田已经有80%转为鱼塘了。他们描述了集镇财富两个最重要的来源:养鱼和养蚕,并指出池塘四周的堤坝也种上了桑树。鱼苗又被称为“鱼花”,用网箱来捕捞,这些网箱悬挂在西江弯道中建好的架子上。九江自己的鱼埠分布在从广西边境直至九江的河流上。一旦收获鱼苗便放入九江的池塘中。其中一部分饲养几日后作为鱼种被销往邻近的三角洲村镇的鱼类养殖户。另一部分则在九江的池塘中饲养至成熟,然后用专门配备的船只活着销往整个广东和广东以外。九江当地人主张垄断西江鱼苗的养殖,声称九江的领导地位在国家的支持下能够得到执行。<sup>⑧</sup>

零星的证据证明了明朝时期鱼类贸易对九江精英的重要性。例如曾氏家族因控制鱼埠而获得其财富的一部分。广西官员曾俊和曾储的堂弟曾傲因打理家产而闻名,而其他的曾氏族人则已入仕。他获得了德庆州一个庞大的鱼埠,德庆州在西江北岸靠近广西边境的地方。曾仕慎是曾储的孙子,帮助曾

① 《梧州府志》卷二,第33b页。

② 《明中宪大夫镇远郡侯莲水陈君配孺人唐氏合葬墓志铭》,广州沙北村陈家祠石刻 《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卷十一,第108a页 《南海九江乡志》卷四,第27b页。

③ 关于三角洲对广西粮食的日益依赖,参见 Marks, *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pp. 252-264; 陈春声 《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 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第79-82页。这种经济关系让人联想到遍及东南亚的上游-下游交换模式,在该模式中下游地区专注于手工业和贸易,而上游地区的人则专注于农业生产。例如湄公河,参见 Andrew Walker, *The Legend of the Golden Boat: Regulation, Trade and Traders in the Borderlands of Laos, Thailand, China and Burm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p. 39.

④ 《南海九江乡志》卷一,第21a页。很多船只运送的是从上游收购的、准备销往三角洲地区的粮食。《南海九江乡志》卷一,第29b页。

⑤ 《九江儒林乡志》卷十八,第15a、22b页。

⑥ 简朝亮 《读书堂集》卷七,1903年,第30a页。

⑦ 《龙州县志》,192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藏手抄本,第384页。

⑧ 《奉宪禁止拦封九江民船勒石永遵》,梧州中山公园石刻,1780年; Steven B. Miles, "From Small Fry to Big Fish: Representing the Rise of Jiujiang Township, Nanhai County, 1395-1657," *Ming Studies*, Vol. 48 (2003), pp. 73-75.

傲管理这类生意, 这反过来维持了九江曾氏祠堂的祭祀。<sup>①</sup>

有很多清朝时期九江人在上游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文本流传下来。在广东同乡会(粤东会馆)的石刻上发现了同九江有关的一些名称, 这些会馆位于长距离河流贸易中最重要的三个广西圩镇, 它们在级别上都是位于县城之下的镇。<sup>②</sup> 在广西, 最早的粤东会馆建于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年); 至清朝末叶, 重要的商业圩镇几乎都建有一个会馆。由于不同的社会和经济条件, 这些会馆所服务的商人的故乡各不相同, 可能是一个个不同的城镇; 然而, 广西最大的粤东会馆, 包括这里描述的三个, 都是由类似九江这样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东商人所控制。广西三个著名圩镇中最大的是戎圩, 它位于苍梧县境内, 在梧州上游几英里。戎圩的支配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广西大米向下游船运到三角洲地区的中心。<sup>③</sup> 九江的名字出现在纪念 1788 年改建戎圩粤东会馆的石碑上。铭文中还提到九江埠捐赠的用于供桌的 100 两银子。还有一些人的捐赠规模较小, 铭文显示他们是九江人(或是商号): 三位关氏、一位曾氏、一位梁氏以及金和商铺。<sup>④</sup> “九江埠”这一名称作为捐资人也出现在另一块石碑上, 它是为了纪念 1805 年列圣宫后殿增建一高阁, 列圣宫位于广西第二著名的圩镇平南县的大乌(现为大安)。大乌主要出口桂皮, 从平南用船沿西江出售至海外, 列圣宫其实是一个建筑群中的一部分, 这个建筑群还包括一个粤东会馆。<sup>⑤</sup> 广西第三个重要的圩镇是桂平县的江口。一块 1793 年纪念江口粤东会馆成立的石碑上刻有“民船九江万福捐银 144 两”的字样。<sup>⑥</sup>

成功的商人利用在西江流域及其周边贸易获得的银两来维系家族, 并维护九江当地机构和基础设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清朝九江商人明禄海的传说。据说他曾在贵县(现为贵港)经营大米和花生油贸易。一则故事提到有一次他从广西返程时, 他的船撞上了河中的石头, 这通常会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但是石头滑进了它撞在船上的破洞, 阻止水淹进来, 明禄海于是得以安全返航。至今明氏族人中的一位老人仍记得一句老话“广东明禄海, 船到石头开。”<sup>⑦</sup> 另一个故事称明禄海是贪婪的, 但是 1883 年的地方志将其刻画为一个慈善家: 他捐资用石头重建了其九江故里桥梁的地基, 此后该桥被称为禄海桥。<sup>⑧</sup>

另一个例子是义宁县署知县朱文锦的第十代传人朱廷贵(约 1781—1849 年)。<sup>⑨</sup> 其传记声称因为家贫且丧父, 他在 18 岁时放弃学业“跳身西徼”, 前往龙州经商。<sup>⑩</sup> 几年后, 他迁往越南河内做食盐贸易, 每年会去云南东南部和广西西南部。<sup>⑪</sup> 经商多年后, 朱廷贵退休回到九江, 并最终葬在那里。朱廷贵在九江有一妻张氏, 在河内有一妻杜氏(Đỗ)。他的长子是张氏所生, 剩下的四个儿子都是妾杜氏所生。两个庶出的儿子: 奎元和福元, 因资助九江朱氏家族而闻名。<sup>⑫</sup> 他们捐赠了大量的资金,

① 《南海九江乡志》卷四, 第 54a; 卷五, 第 1b 页。

② 宾长初《广西近代圩镇的综合考察》, 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 第 20、24—25 页; 吴小凤《明代广西城市圩镇建设研究》, 《广西民族研究》2004 年第 2 期。

③ 刘文俊《农业与广西近代圩镇》, 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 第 151 页。

④ 《重建粤东会馆题名碑记》, 苍梧(龙圩)粤东会馆石刻, 1788 年。

⑤ 《列圣宫增建后楼》, 平南县大安镇粤东会馆嘉庆年间石刻“Qiying to Davis,” Nov. 11, 1844,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F0682/1977/143 《平南县志》卷五, 1835 年, 第 11b—12a 页 《平南县志》卷七, 1884 年, 第 22a 页。

⑥ 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 南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 1962 年, 第 249—251 页。

⑦ 2008 年 6 月 20 日于南海九江镇沙滘村永昌里所记田野笔记。

⑧ 《九江儒林乡志》卷四, 第 59a 页。

⑨ 朱廷贵原名朱庭桂, 写法不同但是在官话和广东话中发音相同。《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卷五, 第 85a 页。

⑩ 朱次琦《朱九江先生集》卷九,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7 年, 第 10a 页。

⑪ 西江支流地区推动了两个地区之间的贸易, 一端是越南北部的高平和谅山, 另一端是龙州。A. P. A. Bouinai, *The Lungchow Region: Its Frontier River Roads, Towns and Marts, China Maritime Customs, Special Series 39, 1923*, pp. 4—7.

⑫ 朱次琦《朱九江先生集》卷九, 第 10a—11a 页。同广西大多数重要的商业地区一样, 龙州也有一个粤东会馆, 成立于 1707 年, 在 1796 年和 1837 年两次重修。《龙州县志》, 第 93、394 页。张姓在九江是一个非常普遍和相当有名望的姓氏。见《九江儒林乡志》; 光绪《南海氏族》卷二《主簿司》, 第 4a—b 页。

“捐银1700余两修朱氏家谱”(1869年版)，“又捐银3000两增置祠堂”。<sup>①</sup>

正如明禄海和朱廷贵的例子所展示的那样，通过跨区域的人员流动、货物交易以及货币流通，来自九江的移民商人将九江同西江流域的上游城镇联系在一起。九江移民的沿河流动并没有遵循等级制度的模式；反之，九江成为了上游“外围”地区的大都会，这些地区从德庆县的鱼埠，到更上游地区的县和府，甚至到达西江流域源头以外地区外国政权的首都。

### 上游地区九江后裔的主张

除了探究九江当地人以官员、考生和商人的身份顺游而上的活动之外，另一个考察移民的角度是研究上游地区九江后裔的一些主张。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关于中国移民的研究，在“短期移民”(或称“旅居者”)和“永久移民”(或称“定居者”)之间都做了明确的区分。<sup>②</sup>对于明清时期西江流域的九江移民而言，这种区分至少是有些夸大的。上游地区九江后裔的主张表明，永久性定居起始于临时性的迁移，很多九江家族将临时迁移作为提高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一种手段。同样，九江官员、考生和商人活跃的上游河港也成为来自九江的永久定居者的目的地。

上游的材料补充了在南海和九江当地发现的向上游迁移的许多零星案例。<sup>③</sup>明氏家族是苍梧县几个例子中的一个，苍梧县是梧州府治所在，就在广东边界的另一边。明氏家族落户在苍梧县东北的东安镇(现为石桥镇)。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是19世纪的九江移民明瑜光，此人在东安卖甜糕而得到了他的第一笔资金，他的儿子将生意扩展到各种商品。<sup>④</sup>其他来自九江的明氏族人在商人明瑜光定居东安时已经在东安安定下来。第一个以苍梧户籍中举的九江人是明懋伦，他作为东安居民于1798年中举。<sup>⑤</sup>

长洲是九江移民在苍梧县的另一个目的地，它是梧州上游干流中的一个岛屿，与南岸戎圩大市场遥相呼应。1883年九江地方志的编者断言长洲一直是九江的鱼埠，其居民都有九江的血统。但是编者抱怨，“今则世业于其地，反成土著，虽皆能道吾乡事，然俱不复有故土之怀矣。造鱼之法向所不传于外者，今外人多能之”。<sup>⑥</sup>结果九江养殖户无法卖出之前的高价。在九江地方志的记述中，移居长洲的人都是无名氏。但是九江朱氏家谱保留了一些真实的长洲移民的姓名。根据家谱表，他们都是朱诰的后代，此人是在泷水县学中成为生员的九江朱氏族人。如果朱诰(朱氏的第七代宗族成员)活跃于明嘉靖年间，那么位列第十一代的三名移民后代(再加上这些人的五个儿子，属于第十二代)，在清朝早期必已落户长洲。<sup>⑦</sup>

<sup>①</sup> 《九江儒林乡志》卷十五，第5b-6a页。另一位活跃在广西和越南的商人是关谅(或是关亮)(1764?—1818?)，他青年时代经商，“尝以一舟往来两粤间”；他的弟弟关理(1767?—1842?)年轻时旅居越南(安南)，年老退休返回九江。关理的大儿子关升元应该在越南经营过贸易；关升元和他的夫人张氏葬于三角洲的老家，关升元的两个妾，陈氏(Trần)和阮氏(Nguyễn)均葬于越南。《关树德堂家谱》卷六，第53a-54a页；卷十七，第36a-37b页。

<sup>②</sup> 王庚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旅居者和定居者之间差异的经典论述。Wang Gungwu, “Sojourning: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Southeast Asia,” in Anthony Reid, ed.,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t. Leonards, Australia: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and Allen & Unwin, 1996, pp. 1-14。关于国内迁移，G·威廉·施坚雅区分了永久性外迁移民同人才与土特产的出口的差异。Skinner, “Mobility Strateg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 335。

<sup>③</sup> 九江曾氏家族移居广西的案例中提及，有一个人大约在清初迁至平乐府荔浦县，还有兄弟五人很可能在18世纪因移居广西而闻名。《武城曾氏重修族谱》，1879年，《彦恩房系》，第2b页，《即观房系》，第2a-b页。

<sup>④</sup> 2010年6月24日于苍梧县石桥镇所记田野笔记《苍梧石桥明氏家谱》，未题名手抄本，年代不明。在这个家谱中九江祖先的名字同我在九江永昌里查阅的手抄本家谱一致。《广东南海九江明氏家谱》，年代不明。共和国时期的地方志确认，明氏家族同时有人定居在东安和苍梧县城。《苍梧县志》之《明氏篇》，1941年，第2a页。

<sup>⑤</sup> 《苍梧县志》卷四，1874年，第31a页。另一个九江人刘荣光在19世纪50年代初以东安镇户籍成为恩贡，苍梧地方志认为其确切时间是1851年，九江地方志认为是1852年。《苍梧县志》卷四，1874年，第36b页。《九江儒林乡志》卷十，第53b页。

<sup>⑥</sup> 《九江儒林乡志》卷五，第26b-27a页。1874年苍梧地方志的编纂者提到，“鱼花”是在分布在西江梧州沿岸几十里的鱼埠里收获的。《苍梧县志》卷六，1874年，第7b页。

<sup>⑦</sup> 《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卷四，第5b、22a-24a、74a-b、77b页。

长洲社会似乎是围绕寺庙而不是以祠堂为中心组织起来的。<sup>①</sup> 一个主要的例外是邓氏家族, 其族人声称他们的祖先是在康熙年间从九江迁移而来。但是从上游的角度来看, 邓氏声称起初他们的祖先垄断了岛上鱼苗的收获、饲养和销售, 之后这种做法才普及到其他家族, 这与九江地方志编纂者的抱怨形成呼应。<sup>②</sup> 共和国时代的地方志指出, 鱼苗业在 19 世纪已经成为长洲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sup>③</sup>

技术传播的另一个例子或许要涉及上游平南县武林镇的朱氏家族。该镇位于西江干流和从大乌圩而下支流的交汇之处。朱氏声称他们是一支不太著名的九江朱氏家族的后代, 而不是送考生去西宁并迁居长洲的那支朱氏家族。武林移民的祖先朱昌炽 (1625—1688 年) 和他的后代在武林定居后以鱼苗业为生。<sup>④</sup> 他们中有些人成功了, 朱方辉 (1853—1916 年), 这支朱氏家族中 1880 年的进士, 有足够的威望受到他在九江的亲戚的热烈欢迎。<sup>⑤</sup>

其余的九江移民定居在武林干流对岸的丹竹圩镇。<sup>⑥</sup> 同附近的大乌一样, 列圣宫 (庙) 是这个圩镇的主庙。<sup>⑦</sup> 1870 年改建时装饰正门的石刻对联是由油行的集福堂捐赠的。一位九江的移民先祖一定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之一。就在丹竹圩镇外面, 是只有一个姓氏的关屋村。这些关氏族人认为他们是九江六关家族之一的后裔。移民的祖先关学锦, 刚开始定居武林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商人, 后来他过河在丹竹开了一间油坊并在关屋村定居。这是 19 世纪初至中期的事情, 因为关学锦在道光年间 (1821—1850 年) 捐了一个监生的头衔。<sup>⑧</sup>

由上游居民提供的、更为错综复杂的九江后裔的主张, 暗示着九江向上游的发展。其中一个例子是另一支立足于甘棠圩的关氏, 甘棠圩是一个重要的盐埠, 在明清时期隶属于永淳县。<sup>⑨</sup> 在咸丰和同治时期 (1851—1874 年), 旅居甘棠从事河流转运贸易的商人发起并资助了一项河流疏浚工程, 即使在秋冬的枯水期, 也能保证全年贸易的进行。从此以后, 商人们可以通过干流将盐从南宁运到桂平, 再到梧州, 最后通过支流向上运到甘棠。从甘棠, 贸易路线连接到更北的一些地方, 并最终到达贵州省。商人们也可以向干流下游贩卖粮食和瓷器到永淳县城, 从永淳既可以到达上游的南宁和龙州, 也可通往下游的桂平、梧州和三角洲。甘棠关氏认为他们是 1644 年广东三水县九江乡某个移民的后裔, 此人后来定居在永淳县露圩附近的谷埠村。19 世纪末, 一名关氏后裔定居在露圩正南方的甘棠圩。称自己是三水县九江乡后裔, 这似乎是一个逻辑“错误”。三水县的记载中没有九江, 关姓在那里也不是一个大姓。但是三水正位于九江沿西江的上游地区; 任何一艘从九江逆流而上的客船或货船都会经过三水, 尤其是西南港, 这是从三角洲进入羚羊峡之前的最后一个停靠点。<sup>⑩</sup>

最后一个例子是凤村圩 (现为平凤) 的蔡姓, 凤村圩位于到达广西之前广东在西江上的最后一

① 历史学家麦思杰好心地将他在五通庙中的消息人士介绍给我。

② 最受九江邓氏关注的祖先是邓“南阳”。光绪《南海氏族》卷二《主簿司》, 第 7a 页。邓氏祠堂一位消息人士声称, 他的祖先来自珠玑巷的九江村。这两条传说似乎可以合为一体, 即从广东北部珠玑巷向珠江三角洲的九江迁徙的传说, 以及从九江到长洲迁徙的传说。2008 年 5 月 22 日于梧州市长洲区与麦思杰调查所得田野笔记《南阳邓氏族谱源流考》, 1999 年, 第 28 页。

③ 《苍梧县志》之《民事篇》, 1941 年, 第 35a 页。

④ 2007 年 6 月 24 日于平南县武林镇所记田野笔记《朱氏族谱, 九江—武林支系》, 年代不明, 第 13 页。

⑤ 朱方辉《羲晋公诗文集》, 南宁, 2003 年再版, 第 192 页。

⑥ 早在明代武林和丹竹就是重要的市集。吴小凤《明代广西城市圩市建设研究》, 《广西民族研究》2004 年第 2 期。

⑦ 《平南县志》卷十, 1884 年, 第 12b 页。

⑧ 见平南县丹竹镇列圣庙里的对联、招牌和柱子上的铭文; 2008 年于平南县丹竹镇所记田野笔记, 《关五福堂族谱》, 1994 年, 第 1—3 页。关学锦在 1884 年的平南地方志中被称为监生, 他通过自己的儿子关景贤获得殊荣。《平南县志》卷十五, 1884 年, 第 18a 页。

⑨ 宾长初《广西近代圩镇的综合考察》, 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 第 42 页。包括甘棠在内的老永淳县部分地区现在已经被纳入宾阳县。

⑩ 《关氏宗支列代全图》, 1876 年, 1990 年手抄本; 2008 年 7 月 26 日于宾阳县甘棠镇所记田野笔记《永淳县志》册一, 1924 年, 第 38a—b 页。《钦加军民府衔补授永淳县正堂加五级纪录五次蒋为晓谕永远革黜抽收漏规而安商旅事》, 宾阳县甘棠镇大庙石刻, 1874 年 2 月 6 日。

个县(封川,现为封开县)。尽管蔡家没有文字家谱,一名宗族成员在2007年仍旧能凭记忆写下其祖先谱系的大概。他指出,他的第七代祖先蔡思贤是从南海九江迁徙而来。1875年印制的佛山城外深村蔡氏的大型族谱,提到了一个叫蔡思贤的人离开深村迁往凤村。一个多世纪之后,凤村的蔡氏发展出他们是从九江而不是从深村移民的传说。凤村蔡氏对家谱的记忆或许表明,他们愿意分享九江在西江上游流域所享有的那种影响的愿望。<sup>①</sup>

在这里描述的每个例子中,九江移民或是在圩镇落户,或是在由九江商人垄断的特定经济环境中定居。而诚如鱼苗技术沿河而上传到长洲和武林所展示的,即使上游港口被纳入九江经济圈内,九江也冒着失去经济资源控制权的风险,其首要的原因恰恰在于九江人的四处迁移将它的影响传播至各地。

### 结 语

本文引用的历史材料表明,从16到19世纪,离开珠江三角洲的九江人往往将目的地选定在西江上游及其支流地区。无论是临时旅居者——包括到广西赴任的官员、在上游落户考取功名的文人以及到上游经商的商人,还是那些固定移民,九江移民的足迹遍布西江流域,甚至远及上游的西林、泗城和龙州。更多的九江移民集中在离家较近的地区,从广东西部的西宁县到广西东部的苍梧县和平南县。这些人集中在西江中部流域地区,不仅是因为距离因素,也因为这里有比上游地区更为密集和专业化的圩镇。<sup>②</sup>

从九江和三角洲地区到远在上游的诸如龙州和西林等地,这些西江及其支流地区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区域体系,就这个层面而言,这一区域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人员的流动而形成的,如这里涉及的九江移民。在16世纪前,广西和中国其他地区的联系主要是通过桂林和长江流域;到了清朝,更重要的纽带是通过梧州和西江流域。<sup>③</sup>这一地理上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九江和其他珠江三角洲城镇移民的结果。通过他们在上游的活动,移民将上游区域并入九江的势力范围。同样,移民活动也受到地理环境、国家政策以及家族为了提高社会经济地位而采取的策略等因素的影响。九江移民轨迹提供了一种将不同地区联结在一起的新模式。集镇应该以每个县的县城为中心联系为一个等级体系,这一假设仍盛行于关于中国南方经济史的研究中。<sup>④</sup>但是这一假设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即通过树枝状模式所解释的那样,相比于所在县中的其他区域,两个相距甚远的内河港口之间或许拥有更多的共通之处。此外,出自九江镇的移民会迁往一些中心地区,它们在行政级别和经济等级上或高于或低于九江。换句话说,九江人未必是从城镇化较低的地方迁往城镇化较高的地方去,反之亦然。目的地的范围明显是由河岸景观所形成的,但是特定地区因为三角洲城镇土著居民男性后裔的迁移(有时候是女性)或多或少地同九江联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江流域是一个人为创造的区域。<sup>⑤</sup>

最后,无论我们认为九江是一个移民社区,一个流散者的家园,还是一个同上游外围地区有关的三角洲拓殖大都市,这里探讨的移民历史强调了撰写这个特定城镇或者其他沿河集镇的纯粹地方史的限制性。要了解九江需要注意它沿所在河流域的活动。要追踪河流两岸的流动景象——这种流动景象在岑时发和他作鱼贩的族人的鬼魅传说中得以概括——便需要一部关于这个城镇、它形成的移民网

<sup>①</sup> 2007年6月25日于平凤所记田野笔记《南海深村蔡氏家谱》卷七,1875年,第4b-5a、9b-10b、22a-24a页;卷九,第55b页。

<sup>②</sup> 宾长初《广西近代圩镇的综合考察》,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第6-7、48页。

<sup>③</sup> 黄滨《广东商人与广西近代圩镇》,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第359-361、377页。

<sup>④</sup> 见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第59-60、342-350页。

<sup>⑤</sup> 例如,在其关于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城镇研究中,蒂莫西·R·马奥尼认为“城市并非组织严密的功能等级的单元,而是同周边体系不断交互作用的特定区域”。Timothy R. Mahoney, "Urban History in a Regional Context: River Towns on the Upper Mississippi, 1840-1860,"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2, No. 2 (1985), p. 319.

络以及被并入这一网络的上游地区的跨区域历史。<sup>①</sup>

### 致谢

本文根据 2011 年 4 月 2 日于檀香山举办的亚洲研究协会和亚洲学者国际会议联席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修改而成。我要感谢本组成员 Luca Gabbiani, Seunghyun Han, Peter C. Perdue 和巫仁恕所提出的意见。同时非常感谢《中国历史学前沿》的两位匿名评审所提出的有益建议。

### 附录



## The Upriver Reach of a Delta Town: Jiujiang Migrants in the West River Basin in the Sixteenth–Nineteenth Centuries

Steven B. Miles<sup>1</sup>, Zou Wei<sup>2</sup>

(1. History Department,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St. Louis, Missouri 63130–4899, U. S. A;

2.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This article situates the Pearl River delta market town of Jiujiang within a system of market towns and cities along the West River and its tributaries in southern China. Exploring the history of this town as an emigrant community, this article follows the upstream movement of officials, civil service examinees, merchants, and permanent settlers along the West River basin betwee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trajectory of migration from this market town was shaped by the geographical factors of the West River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migration, which was related both to strategies that Jiujiang families embraced for socioeconomic advancement and to policies that the Ming and Qing states adopted for controlling the southwestern frontier,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region linked by economic ties and personal networks.

**Key words:** market town, migration, region, Ming, Qing, West River, Pearl River Delta

(责任编辑: 史云鹏)

<sup>①</sup> 研究现代中国海外移民的历史学家们有力地证明,建立在“跨国”实践之上的多方位研究能够使我们获取更为全面的理解。Madeline Y. Hsu,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1882–194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McKeown, *Chinese Migrant Networks and Cultural Change*. 关于最近跨区域历史的例子,参见 Du Yongtao, “Translocal Lineage and the Romance of Homeland Attachment: The Pans of Suzhou in Qing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27, No. 1 (2006), pp. 31–65. 如同彼得·波尔提醒我们的那样,即使在赞美特定的地方性区域的同时,中华帝国晚期的地区史仍将该地区置于包括其他地域在内的更大的帝国疆域之内。Peter K. Bol, “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uzho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1, No. 1 (2001), p. 75.